

中國大陸的酷兒公共文化與政治

殷莉^{*} / Elisabeth L. Engebretsen

廖愛晚、Jamie 翻譯[†]，何春蕤校訂

導言

在今日中國，同志人群和社團在主流媒體與公眾中的可見度與被包容的程度是史無前例的。電視脫口秀為此類話題設立了專題節目，自我認同為同志的男人和女人公開地講述他們的生活，毫不感到羞愧與內疚。從每天的報紙到時尚生活雜誌到各種網站，主流媒體把同志呈現為擁抱「後毛澤東」(post-Mao)時代現代性敘事(modernity narrative)的模範公民與城市消費者。許多城市都出現了同志組織網絡，在地的積極份子不懈的努力在普通民眾中推廣對同性戀的理解，駁斥關於同性戀的負面觀念，並幫助父母接受同志子女。中國各地的在地組織網絡也幫助其他的同志人群克服生活中的困難，培養自我意識和自尊。事實上，相對於異性戀正規，同志的性差異(sexual difference)在主流公共空間中越來越明顯可見，但是只被視為一種「文化」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而且常常被呈現為一種現代的城市生活風格。這種思考方式的一個重要效應就是同志不被看作「政治」差異(political difference)；相反的，同性戀公民是因著他／她們被同

^{*} Research Fellow, Helsinki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Box 4, Fabianinkatu 24, 00160 Helsinki, Finland.
Email: elisabeth.engebretsen@helsinki.fi

[†] 我感謝廖愛晚(Karen)和 Jamie幫助我翻譯文章。

化進入既存的主流社會結構而被寬容。同志身份和社團吸納了後千禧年的都會消費文化，將「自私的個人主義²」、個體戶的經濟成就和物質財富都理想化，因而贏得了社會空間和可見度，得以呈現自我在高等教育和職業上的成就，並且有機會和能力去平衡傳統家庭價值與實現個人自我——簡單來說，他們的「素質」使得他們成為可欲的現代中國公民³。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指出，強調與主流社會和公共文化的規範同化，其實很吊詭的也使得同志得以建立起半公共的空間、社會可見度，甚至使他們的性身份和文化的表達與描述越來越多樣化。但是只關注「同化」其實會犧牲了結構性的轉變和正式的政治效應；就短期來看，這種關注也排除了把同志視為平等的可能，因為若要承認同志是平等的，就需要徹底改變佔支配地位或主導(dominant)論述權力結構，以便建立另類的——既有個別也有集體的——性與性別表現，使得個別的中國人可以真正有平等的機會創造自我和現代的生活風格。上述觀點是基於我在後面將要討論的兩個論點：

首先，作為一個主要尋求同化（而非尋求革命或顛覆）的少數文化，同志社團並不挑戰社會的穩定或政治權威，因此也不會使人感覺它們會造成「不穩定」或「亂」。因此，相較於宗教和政治上的少數，此刻同志社團並不會承受同樣程度的積極監控與鎮壓。

其次，儘管已經浮現了同志可見度和自我再現，既存的主

² Yan Yunxiang, *Private Lives under socialism: 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2003).

³ Lisa Rofel, "Qualities of desire: Imagining gay identities in China," *GLQ*, 54.4 (1999): 451-474.

導醫療—科學同性戀範式仍然框架了大部份主流媒體對同志文化的再現⁴。主流的「同性戀」描述把同性性慾扣連在道德和精神偏差、犯罪及非中國人行為上面。英國學者Harriet Evans也觀察到，「同情的要求寬容和承認，以及持續將同性戀視為偏差或病態」，這之間是有張力的。說真的，中國的民間知識很主要的一部份仍然認為同性性愛是病或罪行，就和癌症和賣淫一樣，需要被治療、懲罰或消滅。

在這裏需要強調，今日中國大陸逐漸成形的同志身分與社群的同性性愛，其實和主流講的同性戀非常不一樣。同志認同——以及隨後出現的許許多多身分和範疇，例如拉拉、T、婆、不分、「半」、以及其他——是種很不一樣的同性戀認同：活出這個同志認同的無數個人，要不是把個人情慾和關係放在人生的核心，也會把它當成很重要不可少的成份。換句話說，他們作為中國男人和中國女人的身份很根本的有賴於他們所認同的性範疇(sexual category)。新選擇和舊規範之間的張力在很多方面映照出中國大陸當代社會廣泛的轉變與特質，而這個轉變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和成形的領域之一就是空間和公／私領域之間的關係。後毛時代現代化、改革開放30年來的結果之一，就是一個從政府權威與檢查制度中部份獨立出來的公共領域已然成形；這個變化使得少數群體可以和官方規範與政策並肩發聲現形，這是截然不同於過去的。談論不同生活方式與愛情的另類聲音已經開始挑戰主流標準，並且鼓勵人們重新評估在家庭、婚姻和浪漫等方面既存的嚴謹規範。「同性」的性主體和國家主體於是得以並存於一個危險不穩的平衡活動中。寬容與不容、接受與排斥、甚至暴力，都

⁴ 艾華(Harriet Evans)，〈中國的女性與性相：1949年以來的性別話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1997]。

在不斷的游移中。

接下來，我將討論中國大陸同志認同和社群的新公共可見度以及正面再現，特別是和拉拉相關的部份。我想辯論的關鍵問題是：在何種程度上，同志可見度和公共參與得以轉化為寬容、認可、和性少數的平等？但是首先我要扼要地討論這個變化的脈絡，指出它和空間轉化的過程如何相關，又如何形成同志論述浮現的可能性。

「同志」話語和空間的出現

就像世界上其它地區同性戀次文化在不同歷史時空中的浮現過程一樣，其發展總是和更大範圍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遷相關，而且這些發展和變遷既是在地的也是全球的。目前公認的是，中國大陸的同志認同和社群是在1990年代中期在城市中出現的⁵。在此之前，男女同性戀者幾乎不可能找到伴侶並長相廝守，只有男同志可能在公園或公廁等公共空間裡找到露水姻緣。非正式的關係網絡和朋友群落即使存在，也只是臨時湊合、私下聯繫的，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可見度。長期的同性伴侶非常少見，因此同性戀的存在被當成孤立的、等待診斷和矯治的現象，而非存在於社會脈絡中的個人身份認同。同性慾望於是被視為道德、社會、政治上的偏差，由醫學－科學來診斷，與文化和社會徹底隔絕。

1990年代開始，同性戀話題以愈發寬容和正面的方式進入主流公共文化及社會，這一切緣由何在？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⁵ 可參看He Xiaopei, "Birthday in Beijing: Women tongzhi organizing in the 1990s China," *IIAS Newsletter*, issue 29 (2000): 10; Wang Ching-ning, *Buy a PC, otherwise get married: What the phenomenon of lala teaches us*,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4.

首先是因為性少數被視為與改革開放政策有關。中國現代化的成就之一有賴於它是否能夠而且願意主動吸納少數族群人口融入進步的政策，原先這種觀點只是針對鄉村地區的少數民族，但是1992年李銀河與王小波首開先河進行有關中國男同性戀的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坤認為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就在於它事關現代的國族打造。楊坤說：「在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中國社會，同性戀者既然是這大社會的一小群人，就理應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如果我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能夠把社會上的各種現象都像這樣加以深入的觀察和研究，並把成果積累起來，我們就可以對中國社會甚至整個人類社會具有更加確切的理解⁶。」楊的評論清晰地表露出一種常見於中國人類學少數民族研究中的觀點，即認為只有理解少數民族，並將他們納入主流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才能成功。有鑑於此，在使邊緣人群融入主流社會及發展進程的設想中，性少數人群也逐漸有了一席之地。

其次，這種變遷也是後毛澤東時代社會及倫理轉變的一部份。私密關係、浪漫感情、談情說愛以及個人主義，如今都獲得了正當性而且還愈發時髦，甚至成為主流話語和媒體爭相追逐的對象。有評論者認為這是中國整體上的「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的一部份，並凸顯這種看似戲劇性的從沉默到開放、從壓迫到自由、從強調集體主義到追求個人快樂的轉變⁷。當然，事實往往沒這麼簡單，各種範式其實並存，傳統／現代、陳舊／嶄新、中國／西方競爭，之間有著令人不安的張力。但是，如果

6 《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1992]，1-2。

7 See, for instance, James Farrer,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2).

說爭取政治上的平等還為時過早的話，個人自由化和社會現代化至少給了少數族群一個站出來伸張自身社會能見度的機會。深刻的變化就以這種方式發生了。

第三，同志文化的成長得益於改革開放的政策效應，也得益於和港臺同志社群聯繫的加強。這種和港臺同志的聯繫提升了大陸同性戀者的自我認同感和群體驕傲感，也使得中國大陸的同志得以和已經壯大活躍、文化相近、語言相通的港臺同志社群串連起來。同性戀相關出版物在大陸雖是非法，港臺的同志書籍卻悄然潛入，提供了肯定自我的同志論述，以挑戰關於同性戀的官方說法。

最後，這些變遷基本上相關的是空間的變化，也是對於公／私、個人／集體的重新界定。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政府某種程度退出了對人們日常私人生活進行直接的、侵入性的干預，非正式的私人領域得以成長，隨之而來的是新空間和新選擇浮現，與既有主流並肩存在。這種新的空間模糊了之前涇渭分明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別，創造了一個半私人化的、非正式的公共領域，在此，人們得以分享親密故事，包括愛與性。這個新的公共並不有賴於絕對明顯可見、表露無遺的參與模式；含蓄的、迂迴的、流動的參與促成了一種「幽微的」、特別適合像同志這種邊緣社群的公共空間⁸。在這種脈絡中，1990年代末期網際網路在中國的出現，它的普及和廉價，都進一步幫助創造和維持了半私人化的公共空間。

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遷（包括一個不斷擴大的非正式、少管理的公共領域，以及公—私分野的變化）對於同志文

⁸ Liu Jen-ping & Ding Naifei,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 (2005): 30-55.

化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方面，這個新的非正式公共文化使得同志空間的存在成為可能，在此一空間中，個人可以創造並參與社區生活，但不需要正式、公開或可見。有論者認為，周華山所說的那種「不高調宣告的實際日常生活行為」是在文化上很適合中國同志的「出櫃」方式⁹。這種特殊的公共參與方式非常含蓄，也因此更能被他人包容，而任何違背此一低調同志集體策略的做法，都冒著使自己作為同志個體以及使整個同志集體蒙受損失的危險。

這些新興的非正式同志公共空間很大部份是因為滿足同志需求而存在。我們可以稱呼它們為「含蓄的公共」(*reticent publics*)，這也凸顯我們極需努力終結男女同性戀者彼此隔絕的孤立狀態，建立並發展同志對自己身份、社區乃至文化的正面意識。下文將要詳述的拉拉沙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有關這些新公共文化的第二個要點就是，非正式的同志據點迅速湧現，不斷多樣化發展，以滿足不同類型的同志的需求。同時，內部的多樣化經營並未削弱這些社交空間對於「新手」(*newcomers*)的重要意義，因為它們是新手跨入穩定的同志身份和同志生活的第一站。這些「基本的」社交場所，例如北京拉拉沙龍，對於LGBTQ社群和運動的巨大多樣性非常重要。在中國當代社會與政治環境中，這些半公開、半私密的社交網路，對異性戀常規及其刻板印象構成了溫和卻積極有效的挑戰。

接下來我將討論每週的拉拉沙龍和公開的同性婚禮，以便展現這些提升同志可見度的策略和話語，我也要討論公共領域和私

⁹ Chou Wah-shan,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Binghamton, NY: Haworth Press, 2000(For a useful critique of Chou, see: Liu and Ding, 2005).

人領域之間、個體和集體之間、個人化和政治化之間持續存在的張力。我將展示以下兩個因素的矛盾共存：提升同志可見度的解放意義，以及主流同性戀模式的粗暴效應。

北京拉拉沙龍的公共生活

北京拉拉沙龍成立於2004年10月，此後一直在北京都市中心的公開場所組織週六下午的女性聚會。沙龍活動的主體是與拉拉生活相關的閒聊，此外也開展同伴教育。沙龍和其它的同志組織密切合作，還開辦熱線電話供女同志傾訴苦惱或諮詢資訊。沙龍的網站作為資訊平臺和社交平臺，影響不僅遍及北京和中國境內，還揚名海外¹⁰。

「沙龍」一詞本身有著長遠的國際歷史，這些歷史使得北京拉拉沙龍和其它地方的女同社區建設、甚至和世界歷史上眾多的獨立解放運動，產生了關聯。沙龍在古希臘時期就有，中世紀時期、文藝復興時期以及動盪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和法國也出現過沙龍的活動。這些沙龍有著不同的特質，例如它們常常和對抗傳統及成規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自由主義者相連。有些人引證哈伯馬斯關於早期現代歐洲公共領域變遷的論述，批判沙龍是專注理性思考的「反對派公共空間」(oppositional publics)的說法¹¹。事實上，沙龍一直是婦女發揮主體力量、參與公共生活的場所。女性主義哲學家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在描述二十世紀初的德國沙龍時曾寫道，沙龍是與眾不同的「女性公共空

¹⁰ www.lalabar.com

¹¹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間」(female public sphere)¹²。本哈比指出，沙龍代表著一種「公共領域的另類形式，在其中，私密性和公開性、公共化和個人化之間的界限被重新討論與重新定義¹³。」本哈比還說，沙龍是實驗個人風格的場所，其中的互動方式相較於嚴格的公共或「社會」領域而言，較少階層化，多了流動性¹⁴。我認為對北京拉拉沙龍的重要性和延續五年不斷的能力而言，本哈比的描述也是恰如其分的。

對北京的女同志來說，沙龍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一個聚集的機會，這個空間既非缺乏社會可見度的私密居處，又非可能造成身份曝光和傷害的高度可見空間。沙龍作為一個社區，在女同志們的心目中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和酒吧、夜店等其它典型的都市娛樂場所相比，沙龍不要求高額的金錢消費，卻更利於就私密話題進行深入交談。作為一個另類公共空間，沙龍為女同志們提供了進行另類交流的機會，這種交流有極大的潛能可以生產新的知識，並為參與者創造自由感和自我實現。就這方面來說，沙龍變成了日常生活羈絆之外的一座「忘憂島」。本哈比筆下的德國沙龍讓猶太女性知識份子能夠暢想一個異於當下的、更加自由的世界；而在北京，拉拉沙龍和其它類似的女同志聚會場所則使得參與者能夠反思主流社會的性別規範。如此，拉拉沙龍挑戰了關於同性戀的主流意識形態，拓展了女性的生命潛能和生活方式。拉拉沙龍的活動鼓勵關於自我和身份的實驗，幫助愛女人的

¹² 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And see Jodi, Dean, "Cybersalons and civil society: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technoculture," *Public Culture* 139.2 (2001): 243-265.

¹³ Benhabib, 2003: xii.

¹⁴ Ibid.; and se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alon,"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oldid=322816653> (downloaded July 13, 2010).

女人們奠定積極的自我價值感。

對於沙龍的定位，沙龍主人安可在2005年12月的沙龍一周年紀念聚會中提出了說明：「沙龍的主要目的是幫助拉拉結交朋友…並且[幫助她們]處理好接下來的事情…比如戀愛，向父母出櫃，婚姻，等等¹⁵。」早些時候，安可在接受權威雜誌《中國新聞週刊》的採訪時曾解釋開辦沙龍的初衷：「[我想讓]大家每週都有個機會相聚聊天，幫她們交到朋友，談談心，看看電影…[簡單說就是]有個自由自在、輕輕鬆鬆的地方¹⁶。」

上述討論可見，作為半公開的空間，拉拉沙龍給女同志們帶來了個人解放的體驗。沙龍的活動結合了女同志的基礎同伴教育以及典型的休閒娛樂項目：遊戲、電影、聊天、交友等等。沙龍在保證參與者匿名性的同時，也提供了一種認同：針對大眾，這種匿名性是需要，但對於拉拉們自己而言，以一種自我肯定、相互認同的動力來追求肯定是迫切需要的。北京拉拉沙龍正是以這種方式構築了一個嶄新的公共空間。當然，沙龍的存在也被既存的異性戀正規常態所形塑與侷限，然而它也容許含蓄的自我表現以及參與方式，整體上創造了正面的認同和社區組織。

像拉拉沙龍這樣的「默會公共空間」(tacit publics)有潛力帶來長期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從而轉化為更為公共。我將在下面的北京公開同志婚禮一節討論這一點。

公開的同性婚禮

¹⁵ Personal field notes.

¹⁶ 鄭楚，〈關於「拉拉」的少數派報告〉，《中國新聞週刊》(2005年8月29日)：36-39。

公開的同性婚禮以及宣導同性婚姻權利的運動，使得拉拉沙龍的同志觀點轉向了主流社會。畢竟，公開的同性婚禮本來就是有意識面對公眾的舉動，這種活動結合了人們耳熟能詳的結婚儀式與尚感陌生的同志元素，其中的矛盾則被積極份子用來作為影響公眾意見的策略。就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活動因為挑戰了人們對同志的成見而頗具顛覆意義：婚禮上出現的同志看起來和「正常人」別無二致，他們舉止得體，言談不俗，是現代都市公民，然而同時，這些策略也重新挪用了主流有關公共行為和少數身份的規範以避免咄咄逼人之態，含蓄低調不越雷池一步。那麼這些公開活動對於促進同志的認可與平等能有何作用呢？

對同志來說，婚姻的議題並非同志社群爭取其感情關係被認可的唯一路徑，中國的同性戀社群也沒有照搬西方主流酷兒運動近年來的做法，將婚姻權作為追尋平等與尊嚴之路上的首要目標。在中國，不論同志還是直人、年輕還是年長，婚姻都是一件大事，甚至是一個難題；不論性向如何，婚姻都是人人關切的問題。婚姻壓力的來源主要有三：家庭（情感上）、社會（交往上）、以及政府（法律上）。它們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迫使人們結婚，結婚（至少短時間內）則使得生活更為便利，因為它符合了家人的期待、社會的規範、和傳統的要求。很多人之所以感覺「婚姻指令」是一種個人選擇是因為「已婚」的地位往往和愉悅幸福、安全穩定有關。我曾在別處提到過，對於許多女同志來說，結婚是一種可欲的責任：女兒結婚，使得父母或自己都壓力倍減，幸福倍增¹⁷。然而，在中國，婚姻仍然是一項社會責任，

¹⁷ 我在另外一篇論文中有詳盡討論E. L. Engebretsen, "Conjugal ideals, intimate practices: Affective ties and relationship strategies among lala ('lesbian') women in contemporary Beijing,"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6.3 (2009): 3-14.

拒絕順從這個命令往往讓當事人付出昂貴的代價，在情感、社交、經濟和法律的層面上都遭遇排擠、暴力、歧視。

在一些同志組織的積極高調推動下，中國的大眾媒體越來越公開的展現官方限制和另類可能之間的表面矛盾。近年來，隨著全球消費文化和追求浪漫愛情的意識形態的傳播，西方的情人節開始進入中國都市民眾的生活，北京的同志運動份子及其支持者則利用這一無政治性但卻有高度象徵意義的契機來組織公開的同性婚姻宣導活動。2009年，在北京商鋪林立、遊人如織的前門大街舉行了一對女同志和一對男同志的婚紗攝影活動，也登上了國內外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活動的目的是要吸引大眾關注同性戀和認同的存在，塑造男女同志的正面「正常」形象，同時抗議婚姻相關法律規定對同志及其家人的不平等待遇。這一頗為不尋常的大膽活動得到了國內外媒體的爭相報導，同志運動份子也以紀錄片的形式保存了活動的全部過程。女同雜誌《Les+》的代表在活動現場隨機訪問路人對同性婚姻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正負參半¹⁸。除了婚禮之外，其它的運動份子也在現場向行人發放紅色鮮花，其上附著單張，倡議人人皆應有結婚權，同志們「和其它一般人一樣」，也希望能自由愛其同性伴侶，並享受婚後的安定生活。

活動中的兩對同志伴侶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戀人，只是為了活動的進行而擔綱各自的角色。在接受女同雜誌《Les+》的採訪時，他們聲稱：「我們這麼做是為了讓大家親眼看到，同性戀者也有真愛。」其中的一位新娘Dana補充：「我夢想有一天可以

¹⁸ Sam，〈陽光下的愛情—2009年情人節頭行動〉，《Les+》19 (2009): 18-21。

（真的）穿上婚紗，和我愛的人結婚¹⁹。」

2009年我和一位北京的資深同志活動份子討論這些活動時，她表示中國的同性婚姻宣導和西方的同志婚權運動不可同日而語。在西方國家，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已經成為衡量當地性少數社群平等程度，甚至整體社會文明程度的尺規；但是在中國，同性婚姻的政治意味不太一樣，它首要是作為一種策略，以吸引大眾關注同志的存在，並正面呈現同志為「正常」人。此外，它也是一個讓人們注意同志未能享受平等地位和權益的策略。同志運動份子用同志婚姻這個行動來倡議的不僅僅也不主要是婚姻平等，而在於讓同志社群和普通民眾（異性戀者）分享中國人重視婚姻的傳統，分享那種人皆有之的對白頭偕老、生死不渝的真愛的嚮往，分享那種對穩定正常生活的肯定。如果訴求這些基本慾望——愛、歸屬、以及受到婚姻的保護——能夠在同志和他人之間建立起共通的人性，那麼大眾對同志的態度就有可能從「默許」進步到承認同志的平等，並最終使同志享有平等的法律保護和生活品質。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同性婚姻策略」主要是一個非正式的、面向社會的策略，而不是明顯的政治行動。同志婚禮活動的參與者並不把矛頭指向政府機構，他們更關心的對象是街市上的普通人，希望普通人能夠看到男女同性戀者並不是傳說中的「怪胎」。因此，中國大陸的同性婚姻宣導活動是在一個非政治的、非正式的公共文化層面上操作，相較於北美酷兒驕傲遊行中那種針對政府的政治論調和與正面挑釁不友善旁觀群眾的典型策略來說，風險比較小。

¹⁹ Ibid. p. 19.

這個新的中國公共領域和同志可見度也在同志社群內部產生了一些顛覆性和創造性的實踐，在（異性戀）婚姻規範以外為同志開闢了多樣化的可能生活風格。2003年，北京的幾位同志運動份子上演了一場另類婚禮——兩位女同志和一位男同志結成了三人夫妻，以此表達「對常態婚姻形式、一夫一妻制度、單一性傾向制度的挑戰」。何小培是當時的快樂新娘之一，在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何描述了他們當時的設想：

我們的婚禮是為了…提倡性傾向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可能無法被納入既有的範疇，也呼籲社會認肯同性戀、非一夫一妻制、以及其它打破常規的親密關係。一男兩女結成夫妻，挑戰了傳統的婚姻制度，也戲弄了這種制度…我們（想要）這場婚禮成為一個供人們討論性關係、理解性慾望、交流性需求的場域。我們同時還希望利用婚姻制度來頌讚並合法化所有的性關係²⁰。

同志婚紗攝影活動和三人婚禮的參與者都質疑主流的婚姻定義，挑戰現行的婚姻制度。這兩起活動的設計都將另類選擇和另類慾望呈現為平等而「正常」，以友善的、非對抗性的、但高度可見的方式來重塑刻板印象。這種策略以靜默的批判和含蓄的政治行動，為社會變革、為性與愛的多種可能性播下了種子。

結語

在導言中，我曾提問：同志可見度的提升是否會帶來公眾對同志身份及文化的認可？拉拉沙龍和同志婚禮的例子說明，近

²⁰ 何小培，“My unconventional marriage or ménage a trois in Beijing”，粉色空間文化發展中心，2006。www.pinkspace.com.cn (downloaded February 16, 2009).

年已經浮現了一個新的正面的同性戀論述以及同志公共空間和參與，它們都挑戰了主流社會原來對同性戀的負面印象；同志運動份子則利用這個非正式公共領域來攪擾有關性、性別、和婚姻制度的主流話語。他們利用官方論述中有關現代性和國族歸屬的敘述來宣告同志也是常人，也應得到平等的權利；在這方面，婚姻制度代表了多數公民所共有的對浪漫愛情和穩定家庭生活的嚮往。拉拉沙龍則在一個更為不公共的層次上操作，主要面向女同志，提升女同志的自我意識，提供相關資源，鼓勵對另類性別和另類性身份的實驗，幫助女同志打破孤立，克服對同性戀的負面想法。如此，同性婚禮和拉拉沙龍針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提供同志身份和生活風格的另類論述和形象。更重要的是，它們本身並不是明顯的政治行動，但其長遠影響卻具有政治意義。

而事實上，同志可見度的提升的確有賴於一定程度的順應和同化。劉人鵬和丁乃非在談及臺灣同志的境況時曾經批判以下觀點：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確保同志社群不要做出過份之舉，以致於失去社會有條件給予同志的寬容²¹，根據此一邏輯，不被包容的越軌行為是同志自己的過錯，而嚴厲的報復是罪有應得。即便如此，當今中國同志社群對公共文化的參與，以及這種參與所產生的積極的、同時也是含蓄的政治效果仍然有其自身的意義。雖然總體上清晰可辨的政治修辭並不存在，但伴隨著「我們也想結婚」之類對主流化和正常化的策略性強調，它們的效果明顯是政治性的。我認為在不遠的將來，這些效果有可能改變現在的主流論述，甚至改變法律架構。因此，在當代中國大陸的脈絡中，主流化和含蓄的行動不應被視為對（性）差異的抹除，也不應被解

²¹ Liu Jen-ping & Ding Naifei,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 (2005): 30-55.

釋成全面壓迫的結果。相反的，這種策略的目的在於策略性的創造一種肯定同志與大眾共有普遍人性的有力話語——一種根本的相同——而我認為，這種策略有潛力推動正面認可同志做為一個文化範疇，未來，這樣的改變也可能產生正式的政治效應。